

《飲中八仙歌》與盛唐詩仙群體

胡 可 先

我們一般認為，盛唐時代能稱得上「詩仙」者就是李白一人，而唐代具有「詩仙」名號者也只有李白一人。而讀了杜甫的《飲中八仙歌》，再考索這八位詩人的生平與文學生涯，我們就知道他們都是盛唐時代的詩人，又都被杜甫歸入「八仙」的行列，從中也可見盛唐時代存在一個特具個性的「詩仙」群體。通過文獻的鉤稽，探討《飲中八仙歌》與盛唐詩仙群體的構成情況，研究盛唐時期的詩人集結、群體宗尚，可以進一步揭示唐詩繁榮的詩人和時代因素。

一、出土文獻與「飲中八仙」新證

杜甫的著名詩篇《飲中八仙歌》通過飲酒塑造了八位文人的形象，而這八位文人，很多我們可以從出土文獻中找到印證的材料，這裡我們進行一定的鉤稽。

一·賀知章

吟詠酒中八仙之一賀知章：「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作為盛唐時期的大文學家賀知章，近年出土他所撰的墓誌很多，這樣詩人和散文家的形象也就完整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這裡我們不作全面的論述，僅將賀知章撰寫的墓誌列之於下：(1)開元二年《唐故朝議大夫給事中上柱國戴府君（令言）墓誌銘并序》，題署：「太常博士賀知章撰。」^①(2)開

元二年《唐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曹州諸軍事曹州刺史上柱國潁川縣開國男許公（臨）墓誌銘并序》，題署：「朝議郎行太常博士□□賀知章撰。」^②(3)開元四年《唐故光祿少卿上柱國虢縣開國子姚君（彝）墓誌銘并序》，題署：「起居郎會稽賀知章撰。」^③(4)開元九年《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國渤海縣開國公封□（禎）□□□□》，題署：「秘書□□會稽賀知章撰。」^④(5)開元九年《□□□□銀青光祿大夫滄州刺史始安郡開國公張府君（有德）墓誌銘》，題署：「秘書少監賀知章撰。」^⑤(6)開元十三年《大唐故大理正陸君（景獻）墓誌銘并序》，題署：「禮部侍郎賀知章撰。」^⑥(7)開元十五年《大唐故司空竇公夫人邠國夫人王氏（內則）墓誌銘并序》，題署：「右庶子集賢學士皇子侍讀賀知章撰。」^⑦(8)開元十五年《大唐故金紫光祿大夫行鄆州刺史贈戶部尚書上柱國河東忠公楊府君（執一）墓誌銘并序》，題署：「右庶子集賢學士賀知章撰。」^⑧(9)開元十五年《大唐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鄭公（績）墓誌銘并序》，題署：「賀知章撰。」^⑨(10)開元二十年《皇朝秘書丞攝侍御史朱公妻太原郡君王氏墓誌并序》，題署：「秘書監集賢學士賀知章纂。」^⑩(11)《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濟州刺史岐王府長史裴府君（子餘）墓誌銘并序》，誌云：「禮部侍郎賀知章，當朝碩彥，知音之友。勒銘操翰，以旌休烈。」^⑪裴子餘卒於開元十四年正月七日，因為初葬和遷葬的原因，先後由禮部侍郎賀知章撰寫銘文，濟州刺史裴耀卿續加題記，太僕少卿韋述最後敘銘。這篇墓誌的最後完成時間是天寶四載十月廿日。

二·李璿

吟詠酒中八仙之一李璿：「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②飲中八仙都是富於文才之人，但以前我們讀杜詩時沒有李璿的作品加以印證，《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收錄李璿《讓皇帝第十一男管母夫人韋氏墓誌銘并序》，題署：「兄昆孤子光祿大夫前行秘書監上柱國汝陽郡王璿撰。」傳世的唐代文獻當中沒有見到李璿的文章，這是新出土墓誌中所見的第一篇李璿的作品，有助於瞭解杜甫《飲中八仙歌》中人物的文學才能。因為墓主韋貞範作為一位女性，可以敘述的經歷並不多，故而墓誌的主體就描寫其品行：

二八之年，容華婉麗，屬椒房妙選，皆是良家。宸睽一臨，便參紫掖。授禮經於保傅，習女誡於姆師。去泰去奢，守真守素。我皇上分憂列岳，委鎮藩維，二畿託以腹心，三輔成其手足。天平海晏，國富人安。均雨露於萬方，布風猷於百郡。兔園修竹，豈獨在於宋郊；桂苑文台，亦聞於岐部。夏六月，敕宮官銓于王庭，以頒寵命，即夫人行焉。於是驛騎□奔，上宮按之於後；詔書駟轉，常侍引之於前。舍宿卸（御）亭，將及岐矣。于時先□跪捧綸旨，闕彼闌閑。設重茵，饌香味，束身而出，延之以入。爰命郡掾，使崇簡奉表陳讓，**不**敢當之。恩□載馳，鴻波廣洽，言無戲發，行不復拔。方始拜首公衙，潔齋別寢，七日七夜，禮以聘之。因後螽斯之道既彰，澣濯之功克著。至明內朗，厚節外融。尤善屬文，妙達絃管。屢移寒暑，幾變星霜。先君以賓奏于京，轉遷絳郡。扈巡於汭，化洽高平。旬雨將甘，雨齊飛，大風與仁風共扇。數年之後，誕育一男，實而無何，遂嬰寢疾。豈謂名醫**不**律，良筮虛傳，非無西國之香，而有北都之變。^③

這段文字對於人物的描寫，可謂維妙維肖，而且用駢體文字出之，說明李璿當時也是一位撰寫駢文的名家。墓誌作為傳記，李璿按墓主的經歷敘

事；作為文學，李璿又刻劃墓主的形象。墓主因屬良家之女，容華婉麗，被選為宮妃。無論在宮廷還是在地方，都隨其夫婿輾轉，「至明內朗，厚節外融」，而且「善於屬文，妙達絃管」，可謂德行兼備，才藝雙美。這樣，作為傳記文學的特徵也就凸顯出來。墓誌寫于天寶元年韋貞範遷葬之時，距其卒年已達二十四年之久，仍然是深情溢於言表，更是難能可貴的。這篇僅見的李璿之文，對我們解讀杜甫的詩篇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李適之

吟詠酒中八仙之一李適之：「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李適之墓誌》近年也已經出土，全題為《唐故光祿大夫行宜春郡太守渭源縣開國公李府君墓誌銘并序》，誌云：「天寶初，遷左相，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光祿大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制曰：『自左相虛位，中朝選賢，求於列辟之中，爾副蒼生之望。』自拜相已來，朝野胥悅，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時李林甫久居右弼，威福由己，便辟巧險，意阻謀深。凡所愛憎，未嘗口議，同惡相濟，密為奏論。及至君前，順之而已。由是惡跡難露，眾莫知之。不利青宮，天下震懼。公意深社稷，彼難措心，轉公為太子少保。又謀陷妃族，構以飛語，出為宜春太守。」墓誌中的這段話，講述李適之為左相時受到李林甫的排擠情況，以至於罷相外遷，都可以與杜甫的詩句相印證。

四·崔宗之

吟詠酒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崔宗之不僅能夠做詩，《全唐詩》尚存其詩。近年亦出土其所撰寫的墓誌銘，《□□□□□□□□□□刺史李公墓誌銘并序》：「□□□□家，字承家，隴西狄道人也。……開元十五年二月廿八日，遘疾終於貝州之官舍，凡壽六十八。以天寶元年七月十九日，與故夫人河東裴氏總夫人

太原王氏合祔于武德馮封北原舊塋，禮也。」末署：「朝議大夫行右司郎中上柱國齊國公崔宗之撰。」又新出土《大唐故工部尚書東都留守上柱國南皮縣開國子贈揚州大都督韋公（虛心）墓誌銘并序》，題署：「外甥朝散大夫守禮部郎中上柱國齊國公崔宗之撰。」墓主天寶元年正月十五日葬。

誌文言及與墓主的關係：「宗之少託外氏，夙遭閔凶。郭秀早孤，思庾哀之撫視；羊曇尚在，懷謝傅之深仁。雪涕為文，以誌泉壤。」誌文對韋虛心的一段評價：「靈慶所鍾，早服訓度，瑩然玉立，泉然海靜，奉以忠信，宣以柔嘉。風格之儀邈乎其峻也，溫良之性頹乎其順也。淺深莫測其量，挹仰未臻其方。自筮仕而登華髮，口無莠言，身無擇行，雖山甫之夙夜在位，吳漢之不離公門，未足喻焉。夫其季文清節，博山密慎，張仲孝友，史魚亮直，皆雅性所合，一以貫之。加以閨門嚴肅，子弟祇畏，儼然終日。雖宴必冠，顧譚威重，未嘗見其傾弛。王邵簡素，造次必于矜莊，故得服冕乘軒卅餘載。所居人化，□去見思，盛德布於官曹，仁惠存乎鄉黨。清議無點，直道始終，可謂大明君子，古之遺愛者矣。」這是一篇多達三千三十六字的長篇墓誌，不僅體現出崔宗之對於其舅氏一生功績的敘說和評價，而且也展示了作為文章大手筆的才力。

五·蘇晉

吟詠酒中八仙之一的蘇晉：「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蘇晉詩作亦存於世，近年亦出土其撰寫的墓誌銘，《唐代墓誌彙編》開元〇七一《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衛尉卿扶陽縣開國公護軍事韋公（頊）墓誌銘并序》（開元六年七月廿九日），題：「前中大夫守泗州刺史上柱國野王縣開國男蘇晉撰。」¹⁷又開元四〇〇《唐同州河西王簿李君故夫人蘇氏（充）墓誌銘并序》（開元廿二年四月六日）：「今銀青光祿大夫、左庶子、河內郡開國公晉之第五女。」¹⁸則為蘇晉之女的墓誌。網路拓片《大唐故冠軍大將軍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御史大夫同紫微黃門平章兵馬事安西大都護上柱

國潞國公（郭湛）墓誌并序》，題署：「禮部侍郎蘇晉撰，前乾定橋三陵判官前濮州鄆城縣丞諸葛嗣宗書。」誌云：「公諱湛，字虔瓘，其先太原人也。」墓主開元十四年九月卒，十二月葬。

六·李白

吟詠酒中八仙之一的李白：「李白一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有關新出文獻對於李白詩的解讀，筆者曾撰有《新出文獻與李白研究述論》¹⁹，可以參看。這裡僅就新出墓誌中直接點明李白的幾方墓誌述之如下：新出土《唐劉復墓誌》：「貞元八年，君臥病長安，而自敘曰：劉復，字公孫，彭城綏餘里□。……廿有四，通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天靖其性，少於交結，未嘗與人論及此學。時吳郡大儒陸晞知之，每列坐，則勸令學文，遂入吳容山，深居一年，制文四十首，為時人所重。後游晉陵、丹楊，與處士琅耶顏胄、廣陵曹評往來贈答。江寧縣丞王昌齡、劍南李白、天水趙象、琅耶王偃多所器異。江寧云：『後來主文者子矣。』然性孤直，勉於所忤，爾後五六年，凋求喪略盡，惟公孫獨存，仕至蘭臺正字。」²⁰新出土裴虔餘撰《唐故秀才河東裴府君（嚴）墓誌銘并序》：「性聰明，弱冠，嗜學為文，不舍晝夜。數年之間，遂博通群籍，能效古為歌詩，迥出時輩，多誦於人口。前輩有李白、李賀，皆名工，時人以此方之。」²¹

七·張旭

吟詠酒中八仙之一的張旭：「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張旭是唐代詩人兼書法家。新出土墓誌中有張旭書的《嚴仁墓誌》，全題為《唐故絳州龍門縣尉嚴府君（仁）墓誌銘并序》（天寶元年十二月一日），末署：「前鄆州內鄉縣令吳郡張萬頃撰，吳郡張旭書。」²²

八·焦遂

吟詠酒中八仙之一的焦遂：「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在新出土文獻中，焦遂以外的七人，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材料進行程度不同的印證，只有焦遂隻字未見。蓋焦遂作為平民身份，不僅出土文獻，即使是傳世文獻記載也較少。唐代的文獻中，只有袁郊的《甘澤謠·陶峴》條有這樣一段記述：「焦遂，天寶中為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為《飲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二、杜甫對李白的理解

《飲中八仙歌》描繪八仙並不是平均用力的，對於所詠歎的八位文人，明顯對李白著力最多，八人之中實際以李白為主，突出了李白「酒中仙」的形象。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是對李白形象最突出的表現。這兩句所要拈出的關鍵字有「詩」「酒」「市」三字，細緻地刻劃了李白在長安游於集市倚酒放狂的情態。就「詩」而言，李白是一位浪漫詩人，他借酒醉而作詩，表現出飄逸的境界。就「酒」而言，李白一生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將進酒》），這樣的詩句在李白的詩中俯拾皆是。李白不僅號為「詩仙」，更稱為「醉聖」。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下載：「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醉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醉聖』。」就市而言，李白在長安，經常往來於集市，《新唐書·李白傳》云：「李白初至長安，玄宗召見，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²⁴在長安市

中，最值得重視者是特別繁華的「西市」。他有《少年行》詩：「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²⁵五陵年少踏盡落花，笑入胡姬酒肆，表現出風流豪放、倜儻瀟灑、爽朗率真的少年形象，也展現出盛唐人物自尊自信的精神風貌。詩寫到此，也表現出長安市最繁華也最有魅力的境界。李白沉醉於此，故把長安市上之酒家描繪得令人豔羨，令人嚮往。美國學者薛愛華在其《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中也說：「在這裡，精明強幹的老闆娘會僱備帶有異國風韻的、面目姣好的胡姬（比如說吐火羅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杯或瑪瑙杯為客人斟滿名貴的美酒。而這些姑娘則會使酒店的生意更加興隆。由胡兒吹簫伴奏的甜潤的歌唱表演和迷人的舞蹈，也是酒店老闆增加銷售量的重要手段，友好和善的服務，正是招攬顧客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這些溫順可人、金髮碧眼的美人兒使詩人們心蕩神迷，從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我們還依稀可以看到她們綽約的風姿。²⁶這段論述可以作為「長安市上酒家眠」的注腳。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玄宗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²⁷《唐詩快》云：「八人中惟李白有謫仙之號，餘七人皆未嘗仙也，然因其自號『酒中八仙』，少陵從而仙之。至今讀其詩，不但飄飄有仙氣，亦且拂拂有酒氣。」²⁸《唐國史補》：「白在翰林，多沉飲，玄宗命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²⁹《新唐書·李白傳》亦言：「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受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³⁰實則上，這兩句是刻劃李白形象的神來之筆。宋人趙次公注云：「蓋在翰院被酒，則在長安市中來而扶以登舟。則竟上船矣，非不上船也。」³¹仇兆鼂《杜詩詳注》引吳論曰：「當時沉香亭之召，正眠酒家，白蓮池之召，扶以登舟，此兩述其事。」³²《錢注杜詩》：「此尤似兒

童之語。夫天子呼之而不上船，正以扶曳登舟狀其酒狂也。豈竟不上船耶？」杜甫正是用了這樣誇張的筆法，生動地描繪出李白飲中的狀態，襯托出「酒中仙」的形象。

杜甫描寫李白的這四句詩，生動地刻劃了醉中李白的形象。斗酒詩百篇，狀其才思敏捷；市上酒家眠，狀其風流倜儻；呼來不上船，狀其醉後狂傲；臣是酒中仙，狀其豪放縱逸。而這四句詩合在一起，表現李白的性格還在於曠達。杜甫最為瞭解李白，這首詩既贊李白之詩，又狀李白之酒，再描寫其游於市，更表現其酒中仙。綜合起來，表現出李白那種敏捷不滯於酒、豪邁不拘於俗、傲岸不屈於勢、狂放不流於肆的曠達性格。這樣的形象，風貌駿發，神采飛揚，千載而下，掩卷遐思，猶在目前。

這首詩側重描寫李白，說明杜甫對於李白非常尊崇，也最能理解。以至於有些學者認為全詩的主旨是表現對於李白的懷念，而其他七人僅僅是李白的陪襯，是連類旁及而已。這一說法雖然不完全符合詩意，但還是能夠啟發讀者在閱讀《飲中八仙歌》的時候，對於李杜關係的進一步思考。李白與杜甫天寶三載在洛陽相遇，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佳話。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³³是對於李白詩歌的稱頌與二人情誼的書寫。故而聞一多在《唐詩雜論》中飽含激情地讚歎李白與杜甫的情誼：「我們該當品三通畫角，發三通播鼓，然後提起筆來蘸飽了金墨，大書而特書。因為我們四千年的歷史裡，除了孔子見老子（假如他們是見過面的）沒有比這兩人的會面，更重大，更神聖，更可紀念的。」³⁴在杜甫的詩集中，還留下了《贈李白》《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飲中八仙歌》《夢李白二首》《昔遊》《遣懷》《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春日憶李白》《冬日有懷李白》《天末懷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不見》等詩十四首。《飲中八仙歌》也代表著盛唐時期的詩人個性鮮明、情誼真誠、尚群尚黨的時代風尚。

三、杜甫對自己的定位

杜甫是《飲中八仙歌》的作者，但詩人應該並不是作為一個完全的旁觀者而審視八仙的行徑，而是作為一個激情奔發的參與者表現八仙的個性。杜甫的《飲中八仙歌》儘管具體的作年尚難以確定，但作于杜甫早年也就是天寶以前的盛唐時期則無可疑。我們考察這個時候杜甫的立身行事，對於理解《飲中八仙歌》具有重要意義。《飲中八仙歌》不是自述詩，沒有直接描寫作者自己，但我們還是可以根據作詩的情境對照杜甫作詩時所處的環境以及其他詩作的參證，來探測杜甫對於自己的定位。程千帆先生對杜甫與「飲中八仙」的關係，定位為「一個醒的與八個醉的」，認為：「如果我們注意到《飲中八仙歌》是杜甫以一雙醒眼看八個醉人的情況之下寫的，表現了他以錯愕和悵惘的心情面對著這一群不失為優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狀態，因而是他後期許多極為燦爛的創作的一個不顯眼的起點，這並非是不重要的。」³⁵程千帆先生以極其敏銳的眼光發現了杜甫作此詩時自己的位置，而這一位對於杜甫後期的詩歌創作道路影響很大。而我們這裡還需要重點考察的是杜甫在盛唐時期能夠作出這首詩而立於於詩酒並與「飲中八仙」的性格關聯。

杜甫早年的情況，在《壯遊》詩中有著較為具體的表述：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

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

呼鷹皂隄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韃，引臂落鸞鷂。

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許與必詞伯，賞游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

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³⁶

這裡我們可以拈出幾個關鍵字「性豪」「嗜酒」「飲酣」「放蕩」「清狂」

「快意」痛飲」，這樣的表現，與李白為首的飲中八仙在對酒的崇尚方面並無二致。實際上，如果從飲酒以表現純真狂放的個性表達方面，杜甫與李白是非常一致的。《寄薛三郎中》詩：「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也談到早年「痛飲」和「嗜酒」但不失真性情。《寄題江外草堂》：「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⑩「飲中八仙」之一賀知章亡後，杜甫作《遣興五首》之一云：「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⑪崇尚賀知章的主要方面就是其「清狂」和「爽氣」。作于天寶年間的《醉時歌》，是題贈廣文博士鄭虔之詩：「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⑫他最讚賞鄭虔的「痛飲」，故稱「痛飲真吾師」，透露出杜甫自己也有與鄭虔「忘形爾汝」、痛飲狂歌的形態，這樣的形態、這樣的行為，我們將其置於「飲中八仙」這一群體之中，也是非常適合的。

其實，《飲中八仙歌》的八位文人，沒有一位是真的「醉」的，他們是通過「醉」而表現醉趣，通過「醉」而透露仙氣，通過「醉」來排遣塊壘。他們對於現實都有清醒的認識，他們的時代是共同的，而他們的遭遇是不同的；他們的內心是人世的，而他們的理想是幻滅的；他們的個性是各異的，而他們對詩酒是沉湎的。杜甫對八仙之所以能夠認識得如此清楚並且能夠細緻地表現出來，當然與自己的身世和心靈要有劇烈的碰撞與契合。杜甫在開元、天寶年間有志於用世而終於無成，使他對八仙的遭遇有著深切的認識與同情之理解。他在天寶九載《進三大禮賦表》中說：「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群而處，浪跡于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汙，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⑬進賦的目的是要由

「沉埋盛時」而得到朝廷使用。而他的目的並沒有完全達到，這與李白的遭遇非常類似。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也有這樣的詩句：「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⑭對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而處境又非常艱難。這樣的矛盾處境與心靈失落感使得他與「飲中八仙」也產生了極大的共鳴，我們覺得這是觸發杜甫創作《飲中八仙歌》的現實和心理動機。

杜甫雖然主要崇尚儒家用世之心，但在現實碰壁後也有一定程度上走向道家一路，這也與「飲中八仙」的道家化傾向就有了一致的方向。他在《壯遊》詩中說「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⑮《遣懷》詩中說「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裡，報答在斯須」，^⑯這也就與李白並無二致了。杜甫的這種性格，也受到其友人的讚賞，任華在《寄杜拾遺》詩中說：「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諸人見所做，無不心膽破。郎官叢裡作狂歌，丞相閣中常醉臥。」^⑰這幾句詩描寫杜甫，與杜甫《飲中八仙歌》描寫飲中八仙在主體上達到了驚人的一致。當然道教對於杜甫的影響也是時代風氣使然，他在年輕時甚至於專門赴王屋山拜訪道士華蓋君，《憶昔行》有這樣的句：「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白茅室，盧老獨啟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懸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⑱他雖拜訪華蓋君而未遇，而這首《憶昔詩》卻留下了杜甫曾經崇尚道教心跡的記載。

綜而言之，矛盾處境與心靈失落使得杜甫也在縱酒痛飲，他在「飲中八仙」的身世和思想上找到契合之處，因而有感而作歌。杜甫作《飲中八仙歌》時，是把自己也置於「飲中八仙」這一大的飲仙和詩仙群體之中的。

四、「飲中八仙」與盛唐詩仙群體

明人王嗣奭《杜臆》云：「描寫八公，各極生平醉趣，而都帶仙氣。或兩句，或三句四句，如雲在晴空，舒卷之自如，亦詩中之仙也。」^④這段話啟迪我們思考是：「酒仙」亦是「詩仙」，而且不僅僅是李白一人，詩中的八人都是「詩仙」，盛唐時壇上實際存著一個「詩仙」群體，李白是這一群體的代表人物。

在當代學者中，研究《飲中八仙歌》最有影響的文章，應該數到程千帆的《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杜甫〈飲中八仙歌〉笺記》^⑤。這篇論文對於唐代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學者們以為程千帆先生讀出了杜甫的「文心」，「在以一雙醒眼看八個醉人的情況下寫的，表現了他的錯愕和惆悵的心情面對著這一群不失為優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狀態」，因而歸結為「八個醉的」，而杜甫則是「一個醒的」，由此而得出這是杜甫現實主義創作的起點。我們覺得程先生的這篇文章的重要意義在於在很多方面給我們啟迪，引發我們思考。而其關鍵不在於「醉」與「醒」的關係方面，更不是要給連同杜甫的九個人進行「醉」和「醒」的定位，也不是簡單地將這首詩歸結為杜甫現實主義創作的起點，而是要考察盛唐文士通過酒和詩以融鑄自我個性的情況。尤其值得我們探討的是由《飲中八仙歌》推衍開去，我們可以考察盛唐時期所存在的「詩仙」群體。

杜甫的《飲中八仙歌》，一般認為「飲中八仙」是賀知章、李璿、李適之、崔宗之、李白、蘇晉、張旭、焦遂八人。但唐人的記載並不一致，李陽冰《草堂集序》云：「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這裡列舉的賀知章、崔宗之都載於《飲中八仙歌》。但范傳正《李白新墓碑》則云：「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人詩凡數百首。」^⑥這裡所說的「裴周南」則不見於《飲中八仙歌》。而李白有《送裴十八

《飲中八仙歌》與盛唐詩仙群體

圖南歸嵩山二首》詩，有關「裴周南」和「裴圖南」，歷代有所爭議。郭沫若說：「裴周南既與李白有這樣深厚的交誼，他和裴圖南是否就是一個人？我看是很可能的。」^⑦周與圖字形相近，二者必有一誤，論理以「圖南」為更適。^⑧李白詩中稱與裴圖南的關係：「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同歸無早晚，潁水有清源。」說明李白與裴圖南有同隱的志趣。但在唐代確有裴周南其人，除了范傳正所作《李公新墓碑》以外，《唐御史台精舍題名》卷三、《舊唐書·高仙芝傳》均有記載，故知郭沫若的推測並非完全可信。清人王琦《李太白年譜》將裴周南列入「飲中八仙」：「天寶二年癸未，四十三歲。公在長安與賀知章、汝陽王璿、崔宗之、裴周南為酒中八仙之遊。」^⑨而這樣的繫年並非沒有問題。我們追溯宋人黃鶴對於《飲中八仙歌》的考證：「蔡興宗《年譜》云天寶五載，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按史，汝陽王天寶九載已薨，賀知章天寶三載，李適之天寶五載，蘇晉開元二十年並已死。此詩當是天寶間追舊事而賦之，未詳何年。蓋李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璿、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人』，公所以有此作也。」^⑩這樣的說法較為圓融通達。這是說在盛唐時期，長安有一批飲酒的文人飲酒賦詩，以李白為代表，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故而杜甫對於這一文人群體賦詠讚歎而做詩。

至於「飲中八仙」或「酒八仙人」「酒中八仙」，也不一定是杜甫詩中的八人，「八仙」之名也並非杜甫首創。浦江清云：「漢、六朝已有『八仙』一名詞，所以盛唐有『飲中八仙』。既言飲中，則此外別有可知。……杜甫于賀李諸公為後輩，他不能妄自尊大，忽加人以徽號。據李陽冰說，當時李白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崔宗之等目為八仙之遊。朝列賦謫仙人詩凡數百首。所以飲中八仙一名目非杜甫所創，而且杜甫詩中有蘇晉而無裴周南。一說有裴周南而八仙之游在天寶初，蘇晉早死了。要之，唐時候有『八仙』一空泛名詞，李白等湊滿八人，作八仙之遊，而名錄也

有出入。」浦先生進一步論述道：「由此看來，在唐前後，八仙觀念是道家的，而且非常空泛。隨時隨地，可以八人實之。杜甫的《飲中八仙歌》是因為李白賀知章等自謂八仙之遊，所以歌詠了。」⁵⁷也就是說，這一群體的形成具有明顯的道家化傾向。我們考察杜甫詩中的所謂「八仙」，賀知章為道家人物，至天寶三載八十餘歲時還歸鄉入道。崔宗之，據《舊唐書》記載：「（李白）浪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⁵⁸蘇晉是一位特殊人物，信佛而飲酒，宋人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注此詩言蘇晉「常於市中飲酒食豬首，時人無識之者」，是其雖信佛而其行事頗具道家化。焦遂，有關記載較少，唐人記載見於袁郊《甘澤謠》：「（陶峴）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上，一舟致賓，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焦遂，天寶中為長官飲徒，時好事者為《飲中八仙歌》。」⁵⁹記載其行事也是明顯的道家氣派。張旭的行事，具有道家風尚，新、舊《唐書》和唐人筆記中都有記載，不煩贅述。李適之與李璣，屬於高官受人排擠而不得志者。適之罷相後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⁶⁰古人以「聖賢」喻酒，清酒為聖人，濁酒為賢人。李適之「罷相」是為了「避賢」，也就是避開濁務，「銜杯」才進入「樂聖」的境界，「聖人」為清酒，「樂聖」也是對清淨生活的崇尚。唐馮贇《雲仙雜記·泛春渠》引《醉仙圖記》：「汝陽王璣，取雲夢石瓮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⁶¹李適之和李璣的這些舉動，都多少帶有一些道家氣派。

我們還要注意的是，盛唐時期的政治背景促成了「飲中八仙」群體的形成。唐代開元盛時，因為皇帝的提倡與朝廷的推動，促成了飲酒賦詩的寬鬆的文化環境。開元十八年二月，「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

迭使起舞，盡歡而去」。⁶²開元二十年四月，「宴百官于上陽東洲，醉者賜以衾褥、肩輿以歸，相屬於路」。⁶³《唐語林》卷一載：「玄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人物嗔咽，金吾衛士指遏不得。上謂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為宴樂，與萬姓同歡。』」⁶⁴《唐摭言》云：「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進士關宴，常寄其間。」⁶⁵因為盛唐時期具有這樣的背景，故而飲酒群體應運而生。文人飲酒又增添了飲酒的文化氛圍，形之於詩，更體現出飲者的個性。《飲中八仙歌》所用的手法是誇張的、浪漫的，但所描寫的人物行徑都是有現實基礎的。即如張旭，詩中有三句表現：「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參之李頎《贈張旭》詩：「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裏江魚，白甌貯香粳。微祿心不屑，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⁶⁶與杜甫所描寫的張旭形象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李頎二十四句詩所表現的內容，杜甫只凝聚在三句之中。因此，我們現在不少研究文章，將飲中八仙的個性張揚與當時的現實政治對立起來的論述，是有失偏頗的。

五、結語

由此我們可得出結論：第一，盛唐的開元、天寶年間，因為皇帝的提倡與朝廷的推動，社會上飲酒的風氣很盛，李白來長安，與當時浪漫詩人賀知章等為詩酒之遊，更推波助瀾，在社會上產生較大影響，故杜甫以此為題材而作《飲中八仙歌》。第二，「詩仙」的名號來源於道家的「八仙」，文人群體具有道家化的思想崇尚，《飲中八仙歌》所詠的八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道家追求。第三，在盛唐詩壇上存在著一個「詩仙」文人群體，而李

白是這一群體的代表，故而「詩仙」名號最後落在了李白的頭上。第四，杜甫《飲中八仙歌》既是盛唐詩仙群體的整體再現，也是詩人形象的個性展示。即如清人李子德云：「似贊似頌，只一二語可得其人生平。妙是敘述，不涉議論，而八公身分自見。」^⑧其描寫八人飲酒個性特徵各不相同，賀知章是醉的狀態「騎馬似乘船」，汝陽王是量的誇張「三斗始朝天」，李適之是勢的烘托「長鯨吸百川」，崔宗之是形的表現「白眼望青天」，蘇晉是神的入化「往往愛逃禪」，李白是詩的激發「一斗詩百篇」，張旭是書的成就「三杯草聖傳」，焦遂是辯的奮啟「闊論驚四筵」。

二〇一四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批准號：14ZDB065)

注

- ① 吳鋼：《全唐文補遺》第七輯，三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三二、三三頁。
- ② 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二四頁。
- ③ 毛陽光 余扶危《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第一七二頁。
- ④ 吳鋼：《全唐文補遺》第四輯，三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一六、一七頁。
- ⑤ 胡海帆、湯燕：《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一九九六、二〇一二》，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一七六頁。
- ⑥ 趙君平、趙文成：《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四〇二頁。
- ⑦ 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四四七頁。
- ⑧ 王仁波：《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一冊，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

年版，第一〇八頁。

- ⑨ 吳鋼：《全唐文補遺》第一輯，三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二一六頁。
- ⑩ 陳長安：《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第十冊，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五五頁。
- ⑪ 毛陽光：《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第三三四頁。
- ⑫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二，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第八二頁。
- ⑬ 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五二四、五二五頁。
- ⑭ 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第四〇六頁。
- ⑮ 趙文成、趙君平：《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第七一一頁。
- ⑯ 李明、劉呆運、李舉綱：《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文物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第一七八頁。
- ⑰ 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二二〇二頁。
- ⑱ 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第一四三二、一四三三頁。
- ⑲ 胡可先：《新出文獻與李白研究述論》，《浙江大學學報》二〇一五年第五期，第六一一〇頁。
- ⑳ 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第四六六頁。
- ㉑ 吳鋼：《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三九四頁。
- ㉒ 樊有升、李獻奇：《河南偃師唐嚴仁墓》，《文物》一九九二年第一〇期，第三六頁。
- ㉓ 袁郊：《甘澤謠》，《叢書集成初編》本，第四頁。
- ㉔ 《新唐書》卷二〇二，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版，第五七六三頁。
- ㉕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六，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第二四二頁。
- ㉖ 薛愛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第七一七八頁。
- ㉗ 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李太白全集》附錄，第一四六一頁。

- ②⑧ 《唐詩快》，《唐詩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第一四〇九頁。
- ②⑨ 李肇：《唐國史補》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六頁。
- ③⑩ 《新唐書》卷二〇二，第五七六三頁。
- ③⑪ 林繼中：《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三九頁。
- ③⑫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二，第八一頁。
- ③⑬ 錢謙益：《錢注杜詩》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二三三頁。
- ③⑭ 鄧魁英：《關於杜甫的〈飲中八仙歌〉》，《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一四頁。實際上，這種說法濫觴于清人何焯，他說：「以太白為綱領，白傳因此詩而附會八人，未嘗如昔人為『竹林之遊』也。」（《義門讀書記》卷五一）
- ③⑮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一，第四五頁。
- ③⑯ 聞一多：《唐詩雜論》，武漢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二二六—二二七頁。
- ③⑰ 程千帆：《一個醒的與八和醉的——杜甫〈飲中八仙歌〉簡記》，《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四年第五期，第一五四頁。
- ③⑱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一六，第一四三八頁。
- ③⑲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一八，第一六二〇頁。
- ④①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二二，第一〇一三頁。
- ④②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七，第五六四頁。
- ④③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三，第一七四頁。
- ④④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二四，第二一〇三頁。
- ④⑤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一，第七三頁。
- ④⑥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一六，第一四三八頁。
- ④⑦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一六，第一四四七頁。
- ④⑧ 《全唐詩》卷二六一，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版，第二九〇三頁。
- ④⑨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二一，第一八八八頁。
- ④⑩ 王嗣奭：《杜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八頁。
- ⑤① 《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四年第五期。
- ⑤② 參郭國慶《通向成功之路——程千帆先生的治學方法》，《古典文學知識》二〇〇二年第二期，第八六頁。
- ⑤③ 李陽冰：《草堂集序》，《李太白全集》卷三二《附錄》一，第一四四三頁。
- ⑤④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第四五頁。
- ⑤⑤ 參趙睿才《〈飲中八仙〉的演化與李白為「翰林供奉」的時間問題》，《山東大學學報》二〇〇八年第五期，第一〇五一—一〇六頁。
- ⑤⑥ 王琦：《李太白年譜》，《李太白全集》卷三五《附錄》五，第一五八七頁。
- ⑤⑦ 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二，第八一頁。
- ⑤⑧ 浦江清：《八仙考》，《浦江清文錄》，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三頁。
- ⑤⑨ 《舊唐書》卷一九〇下，第五〇五三頁。
- ⑤⑩ 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二，《古逸叢書》本，第一〇頁。
- ⑥① 袁郊：《甘澤謠》，《叢書集成初編》本，第四頁。
- ⑥② 李適之：《罷相作》，《全唐詩》卷一〇九，第一一二五頁。
- ⑥③ 馮贇：《雲仙雜記》卷二，《叢書集成初編》本，第一二頁。
- ⑥④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二三，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版，第六七八八頁。
- ⑥⑤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二三，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版，第六七八八頁。
- ⑥⑥ 周勳初：《唐語林校證》卷一，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第五四頁。
- ⑥⑦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二九頁。
- ⑥⑧ 《全唐詩》卷一三二，第一三四〇頁。
- ⑥⑨ 楊倫：《杜詩鏡銓》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一八頁。